

良渚文化的聚落级差及城市萌芽*

刘恒武

(宁波大学文学院 浙江宁波 315211)

王力军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宁波 315010)

The difference of Settlements size refers to the difference in settlement scale and its development level. According to current archaeological data, the settlement size difference originated in the late period of Songze Culture around Tai-lake Basin, arrived atop in the midLiangzhu Culture and continued to its late period. Liangzhu sites reflects the polarization of settlement size difference in the middle Liangzhu Culture, which is the origin and underly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Liangzhu Culture Settlement Size Difference Origin of Urbanization

内容提要 聚落级差是指聚落之间规模尺度与发展水平的差异。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环太湖地区的聚落级差始自崧泽文化晚期,其扩大化过程在良渚文化中期达到顶点。聚落级差作为一种现象一直持续至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遗址群反映出良渚文化中期聚落级差的极端化,已经超越了一般聚落遗存的范畴,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城市。城市萌芽是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扩大程度的标志性结果,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本身也蕴含了城市萌芽的催生力量。

关键词 良渚文化 聚落级差 城市萌芽

中图分类号 K871.13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所谓“聚落级差”是指不同聚落之间规模及发展水平的差异,聚落级差的分析不仅要借助于聚落面积的估算,而且要依凭聚落内部代表性遗物和遗迹的考察。西方人类考古学者用“Settlement Hierarchy”(聚落等级)来定义聚落间的分级,并认为与之对应的是特定地域聚落集群主导权的层次分化^[1],这一观点实际上源自于20世纪50~60年代系统论和信息论的“levels of decision making hierarchy”(决策层系)理论。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跨学科概念借用的妥当性,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早期社会聚落级差的出现或聚落分化的发生,标志着特定地域聚落间的联系形式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演进,而在聚落间规模梯次细化过程的背后,还伴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位

于级差化的聚落群之顶端的“中心聚落”,是早期城市或处在萌芽阶段城市的母体,因此,聚落的级差化与城市的萌芽是两个紧密衔接的历史过程。本文欲以良渚文化为考察对象,探讨一下该文化分布圈内的聚落级差以及聚落级差化背景下城市的萌芽。

一 良渚文化的聚落级差

从考古学角度考察特定地域的聚落级差,无疑要以聚落遗址的比较研究为基础进行。然而,这种聚落遗址的比较,并非单纯的聚落遗址面积的对比,还应包括对于遗址考古学文化内涵的比较。这是因为,聚落级差不仅仅是一种规模意义上的差异,更是一种经济、技术意义上的差异。事实上,在我国黄河及长江流域的聚落考古实践中,由于

收稿日期 2007-04-30

* 本文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5年立项课题[编号J05N102]的部分研究成果。

现存遗址多为漫长时期人类活动痕迹的重叠与交错,特定时期聚落面积的精确测量难度极大或者根本无法完成,故而在聚落集群的研究中针对各聚落遗址文化内涵的比较考察才具有实际价值。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聚落遗址中,哪一类遗迹最具代表性,能够帮助我们管窥聚落整体的规模和发展水平。聚落既为“生聚之所”,居住遗迹——房屋及其周边的日常生活设施遗存,无疑是聚落遗址空间结构的主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居住遗迹储存了聚落在存续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全部信息,实际上,在我们的考古实践中,能够反映聚落特质的重要信息常常来自于居住遗迹外围诸如环壕一类防御设施遗存或墓地等埋葬设施。

在以往良渚文化考古中,集合为片区的居住遗迹很少被发现,这一资料上的缺陷妨碍了聚落个体研究的深入进行。但是,聚落级差研究仍可依靠数量众多的高台墓地和祭祀遗迹等人工构筑物展开。因为聚落并非以居住设施为唯一要素的集合体,作为埋葬设施的墓地和作为宗教设施的祭祀场所也是聚落的有机组成部分。良渚文化高台墓地和祭祀遗迹等人工构筑物对于良渚文化各时期的聚落级差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1. 指示聚落的空间位置;2. 反映聚落的规模大小。

首先,尽管良渚文化以高台墓地和祭祀遗迹为主的构筑物并非日常生活设施,但是应在特定聚落住民的易达半径之内,所以这些遗迹的所在地点基本上能够与聚落的大致位置相互对应。这一点对于我们复原良渚文化特定时期的聚落空间分布体系意义重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良渚文化的祭祀遗迹往往附着于高台墓地(或者说墓地附着于祭祀遗迹),而一些高台墓地则是在房屋遗址的废墟上形成,这种复合型人工构筑物或可称为“高土台遗址”,它们作为聚落空间位置的标识更具有可信性。在此还需要指出,构筑物与聚落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若干个高台墓地和祭祀遗迹也可能同属一个聚落,构筑物与聚落个体的对应关系应根据构筑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内涵联系来分析。

其次,由于高台墓地及祭祀台坛是一种构筑物,需要一定量的劳动力投入方能完成,因此高台墓地和大型祭祀遗迹能够反映其所属聚落的劳动力调集能力,进而帮助我们推断聚落的人口规模。美国人类考古学家提莫斯·厄尔(Timothy Earle)在其《财产权与酋邦的进化》(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s)一文中指出,礼制性

设施和坟丘等大型营造物遗迹的分布模式,是复原史前时代地域社会景观的线索^[2]。具体而言,根据大型营造物分布的研究,可以把握公共劳动的动员规模和流动方向,另一方面,有关大规模祭祀遗迹分布的考察,可以成为判明宗教、权力中心所在地的根据。

可以肯定地说,墓地、祭坛合一的人工堆筑物遗址对于我们探讨良渚文化聚落级差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仅凭构筑物本身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出土遗物的比较研究也是绝对必要的。换言之,良渚文化聚落级差的探讨需要依赖针对高台墓地以及祭坛等构筑物遗址的全信息式的考察。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始现于何时。如果单从文化景观变化(the changes of cultural landscape)的线索进行审视,考察者的视线无疑将交集于崧泽文化晚期的高台墓地(或高土台遗址)。海盐仙坛庙高台墓地的土台主体部分就是在崧泽文化晚期堆筑而成的,该遗址中期遗存(崧泽文化晚期)有一座长方形高土台,由3座土台扩建而成,已发掘部分东西长60米以上,南北宽约9米,土台上埋设墓葬30余座,可以说是一处大型埋葬设施^[3]。此外,南河浜遗址A区崧泽文化晚期墓地也拥有人工土台,土台为覆斗形,规模不大,顶面东西宽10、南北残长10.5、现存高度约1米^[4]。仅就人工堆筑的土台而言,其出现年代甚至可以上溯崧泽文化早期,仙坛庙遗址发掘区西部第8层下就发现了一座崧泽文化早期的人工土台,该土台为长方覆斗形,南北长约10、东西宽约6、现存高度为0.5米。但是,崧泽文化早期出现的这种小型人工构筑物并不能作为估量聚落规模的指标,真正具有指标意义的是仙坛庙崧泽文化晚期高台墓地。如此蔚然可观的人工堆筑物,是长期、大量劳力注入的结果,土台上发现的玉器随葬墓则折射出阶层分化与丧葬礼仪复杂化的社会景象。凡此种种所对应的行为主体,应是一个拥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社会动员力的聚落。虽然目前环太湖地区发现的崧泽文化晚期遗址数量尚不足以使我们能够对当时的聚落分布状况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但是根据仙坛庙崧泽文化晚期高台墓地与同时期建于平地的普通墓地在埋葬设施和丧葬形式上的差异,我们可以推定,聚落级差在崧泽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

到了良渚文化早期,这种由大规模人工构筑物反映出的聚落级差更加明显,而且区域有所扩

大。目前,可以确认包含有良渚文化早期人工堆土遗迹的遗址包括:太湖东侧苏州-上海地区的赵陵山^[5]、福泉山^[6]、张陵山^[7];太湖东南嘉兴-海宁地区的普安桥^[8]、周家浜^[9]、王坟^[10]、达泽庙^[11]和仙坛庙;太湖东北常州-常熟地区的罗墩^[12]。其中,赵陵山、张陵山和罗墩等遗址值得注意。根据发掘报告中的推测,赵陵山人工土台东西长60余米,南北宽约50、高达4米,堆筑过程的完成不晚于良渚文化早期。关于张陵山和罗墩遗址中良渚文化早期的堆土规模,虽然没有相关的参考数据,但是根据堆土厚度和面积来看亦不应低估。更为重要的是,张陵山和罗墩两地都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早期墓葬,玉器随葬墓显示出墓地的规格。还要补充一点,赵陵山与张陵山相距仅5公里,极可能处于同一聚落的活动领域之内,果真如此的话,两遗址所属的聚落与周边一般遗址所代表的聚落显然处于两个差距甚大的梯次,当然,这里所谓的“一般遗址”是指人工构筑物不具规模甚或缺乏、且无高规格墓葬的遗址。

伴随着聚落级差的存在与扩大,聚落间礼仪体系的趋同倾向也更加明显,这可以从玉器的形制、纹饰及配组中得到反映,在良渚文化玉器系统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兽面纹同时见于张陵山、罗墩、达泽庙等3个彼此相距甚遥的遗址。礼仪体系的趋同意味着聚落间联系的加强。

良渚文化中期是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最显著的时期。这时期太湖南侧余杭地区的人工构筑物数量最多,而且密布于50Km²的良渚遗址群范围内。这些人工构筑物包括3类: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13]、瑶山^[14]、反山^[15]、汇观山^[16]等高规格祭坛墓地;姚家墩土台群等复合型人工土台遗址^[17]。嘉兴-海宁地区有大坟^[18]、新地里^[19]、余墩庙^[20]、达泽庙、姚家山^[21]等高台墓地。苏州-上海地区有良渚文化早期延续下来的福泉山、赵陵山、少卿山^[22]等遗址。常州-常熟地区有高城墩高台墓地^[23]。余杭地区以莫角山巨型台基为中心的人工构筑物集群,在礼制设施和高规格墓葬的数量与尺度上远远超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或遗址群,莫角山及其周边构筑物集群对应的巨大社会实体或社会实体组合,位于良渚文化中期环太湖全域聚落规模序列的顶点。福泉山、赵陵山、少卿山等大型高土台遗址则构成第二个梯次,而小规模土台遗址或平地遗址所代表的聚落属于第三个梯次。

那么,聚落梯次的增加是否仅仅意味着聚落规模差的扩大?良渚文化中期聚落间关系是否有

所改变?根据我们对玉器的研究,良渚文化中期以降环太湖各地聚落在礼制意义上的统合,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而玉器的分配与利用正是这种礼制统合的具现形式和现实途径。中期各遗址出土玉器的数量差基本上对应着各遗址人工构筑物的尺度差,因此,聚落级差的背后至少隐含了一个序列化的礼制系统,而位于这一系统轴心的正是莫角山遗址。

良渚晚期以后,环太湖地区的聚落分布格局有所变化。余杭地区人工构筑的营造活动趋于沉寂,而嘉兴-海宁地区除了中期延续下来的有新地里、余墩庙、姚家山等遗址,还增加了庄桥坟^[24]、龙潭港^[25]等新起筑的高台墓地。苏州-上海地区有福泉山高土台遗址和草鞋山高土台遗址^[26]。常州-常熟地区发现有寺墩大型高土台遗址^[27],此外,在无锡市鸿山镇附近还发现了良渚晚期的高台墓地和双祭台遗址^[28]。从遗址的土台规模、墓葬规格、出土玉琮数量来看,寺墩在良渚晚期已经取代莫角山登上了环太湖地区聚落规模序列的顶端,这意味着,良渚文化全域最大的礼制中心由莫角山及其周边转移到了以寺墩为中心的区域。

二 良渚文化的城市萌芽

当我们探讨良渚文化中期的聚落级差问题时,会遇到这样一个概念困惑:如何定义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所映现的社会生活空间?良渚遗址群由3个主要的片区组成: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姚家墩遗址组群、庙前遗址区,莫角山巨型夯土台基应是一个大型礼仪、权力设施的遗迹,位于莫角山之北的姚家墩及周边的卢村、葛家村等遗址反映的是一个高等级生活区,莫角山之东的庙前则是一处大型村落遗址,3个主要片区之间及周围还散布着各种单体遗址,其中包括土垣、塘山制玉作坊遗址、汇观山祭坛墓地和瑶山祭坛墓地等等^[29]。因此,良渚遗址群所揭示的生活空间,并非一般聚落的尺度扩张,也非多个一般聚落的无机组合,而是一种更高级的聚落形态。我们一般把“城市”视为聚落复杂化和大型化的终点,那么,良渚遗址群是否可以用“城市”来定义?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V. G. Childe)曾经在其《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文中列举了早期城市的10项标准^[30]:

1. 扩大的人口规模以及高人口密度
2. 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专门人员
3. 财富的集中与再分配
4. 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和建筑物
5.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6. 文字的出现与应用
7. 科学技术

术的产生 8. 艺术活动 9. 远距离贸易 10. 以地域为基础的集团构成。

虽然柴尔德的学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但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城市起源问题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研究者在城市起源探索中习惯于沿着一个具体化的线索——城墙展开考察,的确,城墙对于城址考古而言是最易识别的标志性遗迹,然而,城墙既非城市的必要条件,也非城市的充分条件,它只是柴尔德所说的“大规模公共设施”的一种。对于城墙遗址的过度强调,容易导致对于无城墙的大型复杂遗址发展水平的低估。

如果以城墙之类大型围合式屏护设施的存在与否作为衡量聚落发展程度的绝对指标,良渚遗址群显然不占优势。但是,从遗址群内祭坛形状的统一性、器物形制风格的一致性来看,遗址群各片区在良渚中期被高度统合在一起。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证明,良渚遗址群所具备的特征已经逼近了柴尔德有关早期城市的10项标准:

1. 面积以及遗址数量。良渚遗址群分布于现在的良渚、长命、瓶窑、安溪等4个乡镇,拥有大约50Km²面积,目前已确认的良渚文化各时期遗址约135处,其中不少是人工堆筑的高土台遗址。由此可以推知,良渚遗址群曾是一个众多人口、多个地域集团的生息空间。

2. 大型人工构筑物。良渚遗址群西侧的莫角山遗址是一处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巨大夯土台基,应为良渚遗址群的中心遗址。在该遗址的发掘调查中还发现了很多柱穴、红烧土,各种迹象证明它是一处拥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和功能的复合型设施。此外,遗址群的西北侧还有一条东西横亘、长达4.3公里的土垣,该遗址是依托若干自然低丘人工堆筑或夯筑而成的,虽然其具体功能有待探讨,但是将之视为一种屏护设施应该无误。如此大规模工程的完成,需要高超的劳动力动员、管理、组织能力加以支持,还需要大量剩余产品的统一征调加以保证。

3. 特殊礼制设施与埋葬设施。良渚遗址群内发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祭坛和玉器大墓合一的高台墓地,它们与普通的中小型墓葬形成鲜明对照,这反映出阶层分化的加剧和财富分配的失衡。根据刘斌的研究,瑶山、汇观山两座方形祭坛的四个方角恰好分别与冬至、夏至的日出、日落方向一致,瑶山、汇观山两座祭坛的设计中可能蕴含了良渚先民关于天文、历法的智慧^[31]。

4. 玉器、石器制作遗址。良渚遗址群内发现有塘山玉器制作遗址和钵衣山石器制作遗址^[32]。玉琮、三叉形器、兽面牌饰等造型独特、纹饰复杂的玉器应该出自专业生产者之手,玉器作坊的发现证明了遗址群内手工业集团的存在。此外,玉器的设计与制作还是一种高水准的艺术活动。

除上述几点之外,良渚遗址群与外界的贸易活动也是可以肯定的,例如,玉料、食盐等物品必须通过跨区域的交换来获得。考古资料也证明,良渚文化的联系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环太湖地区。综上所述,良渚遗址群所反映出的人类生活空间,已经超出一般聚落的范畴,十分接近柴尔德关于“早期城市”的定义。然而,相对于成熟的“早期城市”在理论上所应当包涵的历史物象,良渚遗址群还存在两方面的欠缺。首先是文字运用程度的问题,尽管良渚文化刻划符号的资料还在增加,良渚社会已经拥有文字的可能性也不能轻易排除,迄今发现的考古材料无法证明良渚文化的“文字”抑或刻划符号在思想交流、意图传达等行为过程中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笔者认为,文字利用的普遍程度对于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文字自身的有无。其次,通常被视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指标之一的金属工具制造术,虽然不在柴尔德的10项标准之列,但其作为社会演进里程碑的意义不容忽视。遗憾的是,金属类遗物在良渚遗址群尚未发现。如果认为“城市”的概念较之“大型聚落”更能准确指示良渚遗址群的复杂程度和发展高度,我们就应用“萌芽状态的城市”来定义这种早期城市的初始形态,以区别于柴尔德概念下的完全化的早期城市。无论如何,良渚遗址群丰富了我们关于“城市革命”发生过程的认识,其研究也将深化有关早期城市普遍特点的探讨。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聚落级差与城市萌芽之间的关联。聚落级差是聚落发展不均衡的结果,部分聚落在规模尺度和复杂程度上相对于其它聚落的超越,导致聚落级差的发生,因此,大型聚落的出现和城市的萌芽是聚落级差扩大化的体现。然而,聚落级差的扩大并不仅仅是一个过程、一个结果,聚落级差的扩大过程中还会生发出一种能量,与源自生产技术改良、阶层分化以及礼仪复杂化等方面的动力结合起来,共同促进聚落形态的变化和聚落间关系的调整。具体而言,聚落级差的扩大,必然导致资源分配体系的变动和聚落关系的紧张,进而引发聚落间的对抗、联盟和统合,若干聚落的兼并与统合往往催生超大型聚落,聚落

级差由此进一步扩大。因此,聚落级差的扩大是一个自我助动的过程,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以中心聚落的出现、早期城市萌芽等等现象为阶段性标志,同时也为城市萌芽以及早期城市诞生提供动力。良渚文化中期城市萌芽的出现动因之一,来自发生于崧泽文化晚期的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尽管这一动因不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但其重要性不容低估。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的聚落级差破坏了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以来固有的聚落间力量平衡,使得聚落间关系的不断调整成为必要,进而导致各聚落遵循一定的位序原则进行重组,此时,聚落级差已经超越了规模差异的意义,带上了权力与礼制的色彩。

三 结语

综上所述,环太湖地区史前时代的聚落级差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至良渚文化中期达到高峰,级差现象本身一直延续至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遗址群显示了环太湖地区聚落级差扩大化以及社会复杂化的最高程度,已经是一个处在萌芽状态的城市。良渚文化城市萌芽与聚落形态进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技术的革新,然而,聚落级差扩大化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助动力对于聚落演进的意义也不容忽视,良渚文化聚落级差的探讨是良渚社会进化机制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 [1] Timothy Earle, *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 Chiefdom: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edited by Timothy Earle, pp. 1 ~ 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Henry. Wright, *Recent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77 - 6.
- [2] Timothy Earl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s,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edited by Timothy Earle, pp. 71 ~ 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海盐仙坛庙遗址的发掘》,嘉兴市文化局编《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5 年,第 218 ~ 228 页。
-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衢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第 3 章第 1 节,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第 18 ~ 19 页。
- [5] 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市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 1996 年,第 18 ~ 37 页。
- [6]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 3 章,文物出版社 2000 年,第 42 ~ 124 页。

- [7] 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6 期,1982 年。
- [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4 期。
- [9] [10] [20] [21] 嘉兴市文化局编:《崧泽·良渚文化在嘉兴》,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5 年。
- [1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 1997 年。
- [12]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常熟罗墩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第 7 期。
- [1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 1992 ~ 1993 年的发掘》,《文物》2001 年第 12 期。
-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 [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 年第 7 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文化汇观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12 期。
-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第 105 ~ 115 页。
- [18] 陆耀华:《浙江嘉兴大坟遗址的清理》,《文物》1991 年第 7 期。
- [1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地里》,文物出版社 2006 年。
- [22] 苏州博物馆等:《江苏省昆山市少卿山遗址》,《文物》1988 年第 1 期;苏州博物馆等:《江苏昆山市少卿山遗址的发掘》,《考古》2000 年第 4 期。
- [23] 江苏省高城墩联合考古队:《江阴高城墩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5 期。
- [2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 年第 7 期。
-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考古》2001 年第 10 期。
- [26] 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 1996 年,第 1 ~ 17 页。
- [27] 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第 3 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 年第 2 期。
- [28] 张敏等:《江苏无锡丘承墩遗址首次发现良渚文化高台墓地的双祭台》,《中国文物报》2006 年 4 月 19 日 1 版。
- [2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第 314 ~ 325 页。
- [30] Childe, V. G., *The Urban Revolution*, *Town Planning Review* 21 ~ 1, 1950.
- [31] 刘斌:《良渚文化的祭坛与观象测年》,《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
- [3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钵衣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2 年第 10 期。